

从出口优先与内需扩大走向中性贸易政策^{*}

——出口导向与内需扩展政策的价格、销量与福利效应分析

王根蓓

(上海财经大学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文章以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为原型,建立出口—消费补贴局部均衡模型,并以自由贸易为参照,分别探讨了出口补贴、消费补贴以及二者组合政策的价格、数量和国民福利效应,由此证明了从中性贸易政策、消费补贴政策、出口补贴与消费补贴组合政策到出口补贴政策的最优政策排序。文章提出如下的政策转型建议:(1)以创造就业和加速增长为目标,将单一出口补贴政策转向出口补贴和消费补贴组合政策;(2)以降低贸易摩擦、扩大内需为目标,将内外双重补贴政策转向单一消费补贴政策;(3)以建立和谐市场经济为目标,将非中性贸易政策转向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中性贸易政策。

关键词:出口补贴;消费补贴;出口—消费补贴;出口优先;内需扩大;自由贸易;中性政策

中图分类号:F7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1)01-0038-11

一、问题的提出

在经历了 30 年的超常增长之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同时,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已经连续 15 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也是遭受反倾销最终裁定最多的国家;同时,已连续 4 年成为全球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反倾销涉及的产品已经从劳动密集型产品扩大至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两种相互关联又彼此矛盾的现象的交织出现提出如下的问题:中国贸易摩擦的普遍化、严重化与长期化究竟与我们的出口导向型政策有怎样的联系?我们是否需要主动调整贸易政策,将以出口补贴为基础的出口优先政策转向以消费补贴为核心的内需扩大政策,进而转向出口和内需并重的政策,最终走向以市场竞争与自由贸易为核心的

收稿日期:2010-1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6BJL054)

作者简介:王根蓓(1965—),女,甘肃天水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中性贸易政策?我们将以中国经济为原型,建立两国同质性产品模型,通过比较出口补贴、消费补贴与自由贸易政策的价格、数量与福利效应,对上述问题做出理论回答。

二、文献综述

出口补贴和消费补贴是本文关注的问题,因此,这里我们对相关文献做简要的评述。

(一)出口补贴的相关文献评析

Brander 和 Spencer(1985)指出,对参与国际竞争的本国出口产业提供直接或间接的出口补贴是西方国家的“共同做法”。自 20 世纪 60 年代,Bhagwati 和 Ramaswami(1963)、Johnson(1965)等建立“市场扭曲理论”,以国民福利为标准,评析了一个国家采用包括出口补贴在内的贸易政策的最优排序。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日本在出口导向产业政策的扶持下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其出口补贴政策再度吸引了经济学界的关注。Dixit 和 Grossman(1986)、Feenstra(1988)等将博弈论与产业组织理论应用于国际贸易,建立相互市场模型或第三方市场模型,证明了出口补贴的“利润转移”作用。与这些研究相比,本文的特点为:第一,本文主要采用局部均衡分析,将贸易政策的福利效应和贸易条件效应作为分析的核心;第二,鉴于反倾销与反补贴政策往往将一个国家的某一产业作为调查与惩罚的对象,本文以国家为分析单位,以同质性可贸易品为考察对象,从宏观视角讨论贸易政策的价格、数量和福利效应;第三,本文重点分析以出口导向型与内需扩大型贸易政策为代表的出口补贴和消费补贴;第四,鉴于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已经可以通过改变进出口贸易量或调整贸易政策来影响国际贸易条件,属大国经济情形,本文主要讨论这大国经济情形;第五,本文更关注于出口补贴与消费补贴的贸易条件效应和产出挤出效应这两个引起国际贸易摩擦的因素。

(二)消费税收的相关文献评析

关于刺激社会消费需求的研究,学术界公认始于 Keynes(1936)。他提出,社会总需求取决于总收入。此后,通过调整所得税来影响社会总消费需求的做法成为凯恩斯主义者的重要政策主张。Friedman(1957)建立永久性收入假设,将不同群体的消费差异视为各群体平均收入的差异,而非偏好和文化差异的函数。Hall(1978)将永久性收入假设扩展至不确定情形,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该假说的政策含义是非预期的税收变化可以调整社会消费需求。本文与上述研究的重要区别是,已有研究以总量消费补贴或税收为核心,而本文考察的是从量消费补贴,即通过对购买特定产品的消费者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或税收减免。

三、模 型

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建立如下的局部均衡模型:假设国际市场由本国和外国组成,除了生产和消费非贸易品 A 外,它们还共同生产和消费可贸易品 B。本国是产品 B 的主要生产者和出口者,为国内和国际市场提供该产品;外国是产品 B 的主要消费者和进口者,通过国内部分生产和进口满足国内需求。为了便于讨论贸易政策的福利效应,假设本国对可贸易品 B 的需求和供给均为线性的,分别为:

$$D = D_0 - \phi P \quad (D_0, \phi > 0) \quad (1)$$

$$S = S_0 + \mu P \quad (S_0, \mu > 0) \quad (2)$$

在式(1)和式(2)中, ϕ 和 μ 均为正数,分别反映了产品 B 的需求和供给对价格变动的敏感度, $dS/dP = \mu$, $dD/dS = -\phi$,这表明可贸易品 B 是正常品; D_0 和 S_0 均为正数,分别表示价格为零时可贸易品 B 的最大需求和最低供给,所以反映了除价格以外的其他因素,如收入、偏好、技术等对产品 B 需求和供给的影响。同理,外国对产品 B 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分别为 D^* 和 S^* ,对本国产品 B 的总进口为 $IM = D^* - S^*$ 。为了集中分析作为出口国的本国的贸易政策转型所产生的价格、销量和福利影响,假设外国进口需求方程也是线性的,为:

$$IM = IM_0 - \gamma P_w \quad (IM_0, \gamma > 0) \quad (3)$$

其中, γ 表示进口需求对世界价格 P_w 变动的敏感度。 $dIM/dP_w = -\gamma$; IM_0 表示世界价格为零时可贸易品 B 的最大进口需求,反映了除世界价格需求以外的其他因素对产品 B 需求的影响。为了使讨论有经济意义,假设 D_0 、 S_0 与 IM_0 均充分大,使得 D 、 S 与 IM 均为正数——本国和外国为出口和进口大国的贸易模式不发生逆转。

(一)比较静态分析的参照:自由贸易情形的价格、销量与福利效应

为了对本国贸易政策——出口补贴、消费补贴以及这二者组合的价格、销量与福利效应提供一个参照,首先假定本国和外国实施中性贸易政策,即双方进行自由贸易,一切同价格或数量调整有关的贸易约束或鼓励政策均不存在。可贸易品 B 的国内和国际价格相等, $P = P_w$,即本国和外国价格用同一种货币表示。^①此时,本国的出口供给数量 EX 等于 $S - D$,因此,出口供给函数可以写成:

$$EX = (S_0 - D_0) + (\mu + \phi)P_w \quad (4)$$

将式(3)和式(4)联立,可以得到中性贸易政策——自由贸易情形下的均衡价格和销量:

$$P_F^* = (IM_0 + D_0 - S_0) / \beta$$

$$Q_F^* = IM_0 - \gamma P_F^*$$

$$D_F^* = D_0 - \phi P_F^*; S_F^* = S_0 + \mu P_F^*$$

其中, $\beta \equiv \gamma + \mu + \phi > 0$ 。 P_F^* 为自由贸易情形下的国内和国际均衡价格, Q_F^* 和 D_F^* 分别为均衡出口量和国内需求量, S_F^* 为本国的均衡总供给量。 P_F^* 、 Q_F^* 、 D_F^* 和 S_F^* 均为正数。

福利问题,即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以及国民福利是本文关注的另一个核心。在自由贸易情形下,国民福利为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依据均衡价格和销量,我们得到由可贸易品 B 产生的消费者剩余(CS_F^*)、生产者剩余(PS_F^*)和国民福利(W_F^*):

$$CS_F^* = (D_F^*)^2 / 2\phi$$

$$PS_F^* = (S_F^*)^2 / 2\mu$$

$$W_F^* = (D_F^*)^2 / 2\phi + (S_F^*)^2 / 2\mu$$

(二) 出口补贴的价格、销量与福利效应

为了帮助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各国政府对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以优惠的出口信贷、风险担保以及出口退税等方式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在这里,假设本国经济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政府实行出口优先的贸易政策,即本国政府对单位可贸易品 B 的出口给予数量为 s ($s > 0$) 的从量补贴。同时,进口国采取中性贸易政策,即对产品 B 进行自由贸易。这时,出口国的国内价格和进口国的价格即世界价格存在如下的关系: $P_D = P_W + s$, 本国的出口供给函数式(4)变为:

$$EX_D = (S_0 - D_0) + (\mu + \phi)(P_W + s) \quad (4.1)$$

将式(4.1)和式(3)联立可得到出口补贴情形下的均衡国际和国内价格(P_W^* 和 P_S^*)、均衡出口量和国内供给量(Q_S^* 和 S_S^*)以及国内需求量(D_S^*):

$$P_W^* = P_F^* - s(\mu + \phi) / \beta, P_S^* = P_F^* + s\gamma / \beta$$

$$Q_S^* = Q_F^* + s(\mu + \phi) \gamma / \beta, S_S^* = S_F^* + \mu s \gamma / \beta, D_S^* = D_F^* - s\gamma \phi / \beta$$

1. 出口补贴的价格效应和销量效应

GATT/WTO 的反倾销法规要求对外国供给者提起反倾销指控必须满足的第一个标准是外国供给者被发现以低于公平的价值定价(less than fair value): (1) 其被证明相同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索要的价格低于国内价格(基准价格方法, the price-based method), 或者(2) 其被证明相同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索要的价格低于估计的成本和正常报酬(推定价格方法, the constructed-value method)。在这里,我们将自由贸易情形下的均衡价格作为公平价格。因此,对均衡世界价格和本国国内价格求关于补贴的导数,可以得到如下的出口补贴的价格效应:

$$\partial P_W^* / \partial s = -(\mu + \phi) / \beta < 0, \partial P_S^* / \partial s = \gamma / \beta > 0$$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命题 1: 在大国经济情形下,相对于自由贸易,本国出口补贴的增加会降低可贸易品 B 的世界价格,提高该产品的国内价格。

推论 1:在大国经济情形下,本国出口补贴的增加所导致的世界价格降低幅度越大,则引致外国进行反倾销或反补贴贸易制裁或报复的风险就越大。

根据 WTO 的规定,一个国家征收反倾销或反补贴税的依据,除了出口国的销售价格低于正常价格这个标准外,另外一个标准便是国内产业遭受“实质性的损害”,即外国销售数量大幅增加导致国内市场高度萎缩。在这里,我们将自由贸易情形下的均衡出口量作为公平销量。对均衡出口量、国内销量和供给量求关于补贴的导数,可以得到出口补贴的数量效应:

$$\partial Q_s^* / \partial s = (\mu + \phi)\gamma / \beta > 0, \partial D_s^* / \partial s = -\gamma\phi / \beta < 0, \partial S_s^* / \partial s = \mu\gamma / \beta > 0$$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

命题 2:在大国经济情形下,较之于自由贸易,出口补贴会导致出口量增加和国内销量降低,从而形成国际需求对国内需求的部分“挤出效应”或“替代效应”。在国际出口扩张效应为主导时,本国总供给增加。

推论 2:较之于自由贸易,在大国经济情形下,本国可贸易品的单位出口补贴增加所提高的出口量幅度越大,对外国进口竞争部门的冲击就越大,因此,外国进行反倾销或反补贴贸易制裁或报复的风险就越大,导致贸易摩擦或冲突的可能性就越高。

2. 出口补贴的福利效应

福利变化的方向和幅度是衡量贸易政策优劣的重要指标。在此,我们将自由贸易的福利作为基准,计算得到由出口补贴所产生的本国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与国民福利变化量(ΔPS_s^* 、 ΔCS_s^* 和 ΔW_s^*):

$$\Delta PS_s^* = (S_F + \mu s\gamma / 2\beta) s\gamma / 2\beta > 0$$

$$\Delta CS_s^* = -(D_F - \phi s\gamma / 2\beta) s\gamma / \beta < 0$$

$$\Delta W_s^* = \Delta PS_s^* + \Delta CS_s^* - R_s^* = -(\mu + \phi) s / \beta [Q_s^* + \gamma^2 s / 2\beta] < 0$$

其中, $P_s^* - P_F^* = s\gamma / \beta$ 是本国国内价格上升的幅度, $P_F^* - P_w^* = s(\mu + \phi) / \beta$ 是本国贸易条件恶化的程度, $R_s^* = sQ_s^*$ 是本国政府的出口补贴支出总额, ΔW_s^* 等于因本国贸易条件恶化造成的福利下降($-Q_s^* (\mu + \phi) s / \beta$)与生产效率的损失($-(\mu + \phi) s / \beta (\gamma^2 s / 2\beta)$)之和。为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命题和推论:

命题 3:较之于自由贸易,可贸易品 B 的出口补贴会导致本国该产品生产者剩余和外国消费者剩余增加,该产品的本国消费者剩余和外国生产者剩余以及本国国民总福利下降,而且本国贸易条件恶化的程度越大,则国民福利减少的数量就越多。

推论 3.1:较之于自由贸易,本国可贸易品 B 的贸易条件恶化的程度越大,外国进口竞争者的生产者剩余降低幅度越大,则本国遭受外国反倾销与反补贴的风险就越大,两国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就越高。

推论 3.2:较之于自由贸易,可贸易品 B 的出口补贴使本国生产者成为既定的利益集团,出口补贴程度越大,则该集团以生产者剩余度量的直接受益就

越多;同时,它使该产品的本国消费者以及非贸易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成为受害者。因此,出口补贴带来本国国民福利的净损失。

(三) 消费补贴的价格、销量与福利效应

在此,我们假设本国政府将政策目标由出口优先转变为扩大内需,即对本国居民消费可贸易品 B 提供补贴——为了便于与出口补贴比较,我们假设消费补贴仍采用从量补贴形式,而且数量也等于 s 。同时,外国依旧采用中性的贸易政策。在这种情形下,外国进口需求仍由式(3)表示,本国总出口函数则变为:

$$EX_C = S_C - D_C = (S_0 - D_0 - s\phi) + (\mu + \phi)P_W \quad (4.2)$$

其中, $S_C = S_0 + \mu P_W$ 与 $D_C = D_0 - \phi P_C$ 分别是消费补贴情形下的本国总供给和总需求函数, $P_C = P_W - s$ 为本国消费者接受消费补贴后的购买价格。将方程(4.2)与方程(3)联立,我们得到消费补贴情形下的国内和国际均衡价格(P_W^* 与 P_C^*)、出口量和国内销量(Q_C^* 和 D_C^*)以及总供给量(S_C^*):

$$P_W^* = P_F^* + s\phi/\beta, P_C^* = P_F^* - (\mu + \gamma)s/\beta$$

$$Q_C^* = Q_F^* - \gamma\phi s/\beta, D_C^* = D_F^* + \phi(\mu + \gamma)s/\beta, S_C^* = S_F^* + \mu\gamma/\beta$$

1. 消费补贴的价格效应和数量效应

现在,对国际和国内均衡价格求关于消费补贴的导数,则有如下的结果:

$$dP_W^*/ds = \phi/\beta > 0, dP_C^*/ds = -(\mu + \gamma)/\beta < 0$$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命题:

命题 4:在大国经济情形下,相对于自由贸易,本国对可贸易品 B 的消费补贴的增加会提高该产品的世界价格,从而改善本国的贸易条件。同时,它将降低该产品的国内消费价格。

推论 4:在大国经济情形下,本国消费补贴提高世界价格的幅度越大,则本国贸易条件改善的幅度越大,因此,外国进行反倾销或反补贴贸易制裁或报复的风险就越小。

同理,我们对可贸易品的国内和国际均衡销量求关于消费补贴的导数,得到如下的结果:

$$\partial Q_C^*/\partial s = -\gamma\phi/\beta < 0, \partial D_C^*/\partial s = \phi(\mu + \gamma)/\beta > 0, \partial S_C^*/\partial s = \mu\gamma/\beta > 0$$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

命题 5:在大国经济情形下,相对于自由贸易情形,本国对可贸易品 B 的消费补贴的增加会降低其出口量。同时,它将提高该产品的国内消费量,产生国内需求对出口需求的部分“挤出效应”或“替代效应”。但它最终将提高该产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

推论 5:较之于自由贸易,对可贸易品 B 的消费补贴带来的本国贸易条件改善的程度越大,外国进口竞争者的生产者剩余越多,本国遭受外国反倾销与反补贴的风险就越小,因而,两国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就越低。

2. 消费补贴的福利效应

以自由贸易为基准,我们得到由消费补贴所引发的本国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和国民福利的变化量(ΔCS_C^* 、 ΔPS_C^* 与 ΔW_C^*):

$$\Delta PS_C^* = s\phi/\beta[S_F^* + (2\mu + \gamma)\phi s/2\beta]$$

$$\Delta CS_C^* = [D_F^* + (\mu + \gamma)\phi s/2\beta](\mu + \gamma)s/\beta$$

$$\Delta W_C^* = (s\phi/\beta)Q_F^* - \phi s/\beta[(\mu + \gamma)^2 + \phi\gamma]s/2\beta$$

在此, $P_W^* - P_F^* = s\phi/\beta$ 与 $P_F^* - P_C^* = (\mu + \gamma)s/\beta$ 分别表示消费补贴使本国生产者和消费者价格上升和下降的幅度。在 ΔW_C^* 中, $(s\phi/\beta)Q_F^* > 0$ 为世界价格增加所导致的本国可贸易品 B 出口收入的增加量,而 $-\phi s/\beta[(\mu + \gamma)^2 + \phi\gamma]s/2\beta < 0$ 为消费补贴导致的消费和生产的沉没成本。因此, ΔW_C^* 的符号不确定。为此,我们得到如下的结论:

命题 6:在大国经济情形下,相对于自由贸易,对可贸易品 B 的消费补贴的增加会提高本国的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但是它对国民福利的影响不确定:当消费补贴提高世界价格所增加的出口收入大于、等于或小于消费和生产增加所导致的社会成本增加,国民福利将相应增加、不变或降低。

推论 6.1:较之于自由贸易,对可贸易品 B 的消费补贴使本国该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成为既定的利益集团,消费补贴的程度越大,该集团得到的直接利益就越多,同时,非贸易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成为该政策的受损者。因此,消费补贴对本国国民福利带来的影响不确定。

推论 6.2:较之于出口补贴,消费补贴不会带来外国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的风险,而且其国民福利效应优于出口补贴,即可能具有维持与改善本国国民福利的可能性。

(四)出口补贴和消费补贴组合的价格、销量与福利效应

现在,我们假设本国政府将政策目标由出口优先转变为推动出口和扩大内需并重,即可对贸易品 B 的本国和外国消费者分别提供数量为 s 的消费补贴和出口补贴。因此,本国出口供给函数和进口需求函数分别变为:

$$IM_E = IM_0 - \gamma(P_E - s) \quad (3.1)$$

$$EX_E = S_E - D_E = (S_0 - D_0 - s\phi) + (\mu + \phi)P_E \quad (4.3)$$

式(4.3)中, $S_E = S_0 + \mu P_E$ 与 $D_E = D_0 - \phi(P_E - s)$ 分别是本国新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函数, $P_E - s$ 为本国和外国消费者购买价格, P_E 为本国生产者价格。将式(4.3)与式(3.1)联立,得到出口和消费补贴并存情形下的国内和国际均衡价格(P_E^* 与 P_D^*)、出口量和国内销量(Q_E^* 和 $D_E^* = P_{E-s}^*$)以及国内供给量(S_E^*):

$$P_E^* = P_F^* + (\gamma + \phi)s/\beta, P_D^* = P_F^* - s\mu/\beta$$

$$Q_E^* = Q_F^* + \gamma\mu s/\beta, D_E^* = D_F^* + \phi\mu s/\beta, S_E^* = S_F^* + \mu(\gamma + \phi)s/\beta$$

1. 出口补贴与消费补贴情形下的价格效应和数量效应

现在,对国际和国内均衡价格 P_E^* 与 P_D^* 求关于消费补贴(也是出口补贴)的导数,有:

$$\partial P_E^* / \partial s = (\gamma + \phi) / \beta > 0, \partial P_D^* / \partial s = -\mu / \beta < 0$$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命题 7:在大国经济情形下,相对于自由贸易,本国对可贸易品 B 的消费补贴与出口补贴的增加会提高本国生产者的销售价格,降低本国和外国消费者的购买价格,从而恶化本国的贸易条件。

推论 7:较之于自由贸易,对可贸易品 B 的消费补贴与出口补贴造成本国贸易条件恶化的程度越大,外国进口竞争者的生产压力越大,本国遭受外国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的风险就越大。因而,两国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就越高。

同理,我们对国内和国际均衡销量和国内供给量求关于消费补贴与出口补贴的导数,得到如下的结果:

$$\partial Q_E^* / \partial s = \gamma \mu / \beta > 0, \partial D_E^* / \partial s = \phi \mu / \beta > 0, \partial S_C^* / \partial s = \mu(\gamma + \phi) / \beta > 0$$

由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命题 8:在大国经济情形下,相对于自由贸易,对可贸易品 B 的消费补贴与出口补贴的增加会提高本国生产者的销售数量。同时,它们扩大了本国和外国消费者对该产品的购买数量。因此,消费补贴与出口补贴的增加扩大了本国的总供给和总需求。

推论 8:较之于自由贸易,对可贸易品 B 的消费补贴与出口补贴扩大了本国的总供给和总需求($\partial Q_E^* / \partial s + \partial D_E^* / \partial s = (\gamma + \phi) \mu / \beta > 0$),具有本国出口挤出外国进口竞争产业的“替代效应”($\partial Q_E^* / \partial s = \gamma \mu / \beta$)——替代程度越大,外国进口竞争者的生产者剩余越少,本国遭受外国反倾销与反补贴的风险就越大,两国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就越高。

2. 出口补贴与消费补贴情形下的福利效应

以自由贸易为基准,我们得到由出口补贴与消费补贴并存所引发的本国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和国民福利的变化量:

$$\Delta PS_E^* = [S_F^* + (\gamma + \phi) \mu s / 2\beta] (\gamma + \phi) s / \beta, \Delta CS_E^* = (D_F^* + s \mu \phi / 2\beta) s \mu / \beta$$

$$\Delta W_E^* = \Delta PS_E^* + \Delta CS_E^* - R_E^* = -\{\mu s / \beta Q_F^* + \mu s^2 / 2\beta^2 [\beta(\gamma + \phi) + \mu \gamma]\}$$

其中, $P_E^* - P_F^* = (\gamma + \phi) s / \beta$ 与 $P_F^* - P_D^* = s \mu / \beta$ 分别为出口补贴与消费补贴使生产者和消费者价格上升和下降的幅度。在 ΔW_E^* 中, R_E^* 是政府财政补贴总支出, $-\mu s / \beta Q_F^*$ 为出口价格降低导致的出口收入的减少量, $-\mu s^2 / 2\beta^2 [\beta(\gamma + \phi) + \mu \gamma]$ 为出口补贴与消费补贴导致的消费和生产的沉没成本。因此, ΔW_E^* 的符号为负。由此,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

命题 9:在大国经济情形下,较之于自由贸易,对可贸易品 B 的出口补贴与消费补贴的增加会提高本国该产品的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Delta PS_E^*, \Delta CS_E^* > 0$),但是它同时会损害非贸易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因此会降低

国民福利的总水平($\Delta W_E^* < 0$)。

推论 9.1:较之于自由贸易,对可贸易品 B 的出口补贴与消费补贴组合使本国该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成为既定的利益集团,出口补贴与消费补贴的增加程度越大,则该集团得到的直接利益就越多;同时它们使非贸易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成为该项政策的受害者。因此,该政策加剧了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冲突。

推论 9.2:较之于自由贸易,对可贸易品 B 的出口补贴与消费补贴组合会造成国内和国外消费者价格的同时下降和国民福利的净损失;与出口补贴相比,对可贸易品 B 的消费补贴和出口补贴组合所带来的国内和国外消费者价格下降的幅度较小,外国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的风险较小($|\Delta P_W^*| = s(\mu + \phi)/\beta > |\Delta P_D^*| = s\mu/\beta > 0$),同时会造成国民福利的净损失;较之于消费补贴,对可贸易品 B 的消费补贴和出口补贴组合带来的外国反倾销的风险和国民福利的净损失均较大。

四、结 语

本文以中国经济为原型,建立大国经济出口补贴—消费补贴局部均衡模型,以中性政策即自由贸易政策为参照,首先得到了关于出口补贴政策的如下结论,即在大国经济情形下,出口补贴的增加确实具有恶化贸易条件、挤出外国进口竞争部门产出的效应,因此提高了外国实施反倾销与反补贴的风险。同时,它还具有保护本国出口部门出口商的既得利益、损害消费者利益和非出口部门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的效应,因此导致了本国国民福利的净损失。其次,我们得到了关于消费补贴政策的如下结论,即消费补贴的增加会改善本国贸易条件、增加本国消费,因而降低或消除外国实施反倾销与反补贴的风险,同时,它会损害非出口部门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但两者相抵的结果是对可贸易品的消费补贴产生保持或改善国民福利的可能性。最后,我们得到了关于出口补贴与消费补贴组合政策的如下结论,即它们具有恶化本国贸易条件、挤出外国进口竞争部门产出的效应,因此提高了外国实施反倾销与反补贴的风险。同时,这种组合会损害非出口部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从而导致国民福利的净损失。但在反经济危机的特殊情形下,它具有刺激本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效应。由上述讨论,我们得出最优政策排序为:以完全竞争和自由贸易为核心的中性贸易政策、消费补贴政策、出口补贴和消费补贴组合政策以及出口补贴政策。

在近 30 年的实践中,中国贸易政策的路径沿着与理论相反的方向发展:在出口导向型经济成长初期并且反倾销和反补贴不是贸易摩擦和冲突的主要来源情形下,出口补贴成为中国政府吸引外商投资、加速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工具,它在奠定中国“世界制造业基地”地位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在中国出口

导向型经济成熟发展阶段并且外资企业成为中国出口贸易,特别是出口加工贸易主导力量的情形下,出口补贴政策因具备国际收入分配功能成为外国对华反倾销和反补贴的重要诱因和贸易摩擦与冲突的主要来源。另外,随着中国市场的日益国际化——本国与外国互为市场,消费补贴不仅是应对经济危机的权宜之计,也是本国企业开发与巩固国内市场的长远之计,将出口优先的单一政策目标转型为出口推动和内需扩大并举的双重政策目标成为一种更为现实的选择;但出口补贴和消费补贴具有强烈的国际和国内收入再分配功能,即可对贸易品生产和消费的优惠是以非贸易品部门的利益为代价的;作为在华外资出口企业享受除“两免三减”税收优惠待遇之外的另一种“超国民待遇”,出口补贴和消费补贴的组合不仅会加剧国内各产业和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而且补贴支出会成为政府财政的沉重负担($R_E^* > R_S^*$)。因此,在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反经济危机目标基本实现且外国反倾销与反补贴成为核心贸易摩擦的情形下,将出口推动和内需扩大并举的经济政策转型为以单一消费补贴为核心的内需扩大政策成为内在需要。按照国际经验,当国民收入达到和超过3 000美元时,经济将由生产推动型向消费推动型转变,中国必将经历从世界“生产基地”向“全球市场”的转型。因此,在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进程中,从以出口补贴和消费补贴为核心的政府主导型经济调节机制走向以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市场主导型的经济调节机制将成为国际经济合作和营造国内和谐的必然选择。

* 此文还受到上海财经大学“211工程”第三期项目资助。

注释:

① 汇率是影响贸易双方价格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与美欧贸易摩擦的重要起因。但在这里,为了集中分析出口补贴和消费补贴,暂且忽略汇率问题。

参考文献:

- [1] Bhagwati J, Ramaswami V K. Domestic distortions, tariffs and the theory of optimum subsid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3, 71(1): 44—50.
- [2] Brander J, Spencer B. Export subsidie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rivalr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5, 18(1—2): 83—100.
- [3] Dixit Avinash K, Grossman Gene M. Targeted export promotion with several oligopolistic industr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6, 21(3—4): 233—249.
- [4] Freentra R C. Quality change under trade restraints in Japanese auto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8, 103(1): 131—146.
- [5] Friedman M. 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 [6] Hall R E. 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8, 86: 971—987.

- [7]Johnson H.Optimum trade protection in the present of domestic distortions[A].R Baldwin.Trade,growth,and the balance of payments[C].Amsterdam:North Holland,1965.
- [8]Keynes J M.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and money[M].London:Macmillan,1936.

A Change from Export Priority and the Expansion of Domestic Demand into Neutral Trade Policy: Analysis of Export-oriented and Domestic-demand-expansion Policies

WANG Gen-b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China's export-oriented economy, this paper develops a partial equilibrium model of export-consumption subsidies and discusses the price, quantity and welfare effects of export-subsidy policy, consumption-subsidy policy and their combination. It presents the following ranking of optimal policy instruments: from neutral trade policy, consumption subsidies, the combination of export subsidies and consumption subsidies to export subsidies. According to the above results, this paper suggests the following three changes in policy instruments: firstly, in order to create employment and increase aggregate demand, the pure export-subsidy policy ought to be substitut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export subsidies and consumption subsidies; secondly, in order to reduce trade friction and expand domestic demand, the combination of export subsidies and consumption subsidies should be substituted by the consumption-subsidy policy; thirdly, in order to build up harmonious market economy, the non-neutral trade policy should be substituted by neutral trade policy based on free trade.

Key words: export subsidy; consumption subsidy; export-consumption subsidy; export priority; the expansion of domestic demand; free trade; neutral policy

(责任编辑 周一叶)